

誰來經理香港

黃子健 著



11
67
59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誰來經理香港

盧子健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書名：誰來經理香港

著者：盧子健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八樓 電話：5-753877

發行：華風書局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七樓 電話：5-749495

承印：太古印刷公司

版次：1987年8月初版

定價：港幣30元

書號：ISBN 962-226-143-4

自序

這本書所收集的是我由1980年中至1987年初在《廣角鏡》月刊上曾經發表過的關於香港政治問題評論的部分文章。一向以來，我對出版這類曾經發表過的文章的集子持保留態度，所以經過接近七年的寫作生涯，本書才是輯錄自己文章的第二本。

輯錄曾經出版過的文章的主要缺點是：（一）可能要讀者看曾經看過的文章；（二）文章的時間性不足。不過，出版這類文集也有一些用處，正是這些用處促使我同意出版本書。

第一，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往往是針對一時一事的，又由於篇幅所限，觀點的發揮經常受到限制。把文章輯錄起來，可以把作者的思想更完整地表達。

第二，本書也可作為個人對歷史的見證。本書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於1980年7月。七年以來，香港可說已經歷了極大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這些變化正好印證我在文章內所表達的觀點和信念：香港社會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是歷史大勢所趨。人民作為歷史的主人這個觀念並不表示政府一定為人民服務，但一個政府要維持有效統治，沒有可能不照顧人民的願望，這在香港亦然。

事物的變化在幾個月或甚至一兩年間未必能明確地察覺得到。但回顧過去七年香港的發展，沒有人可以否認香港的政治面貌已經歷重大的變化。希望本書能為這些變化作一個見證。

本書得以順利出版，全賴李國強先生、吳明瑜小姐和廣角鏡出版社的幫忙。謹在這裏向他們致謝。

盧子健

目 錄

誰來經理香港(一).....	1
誰來經理香港(二)	
——政制發展的經驗.....	15
誰來經理香港(三)	
——未來政制的設計.....	25
誰來經理香港(四)	
——政治動員的前景.....	36
1997的挑戰.....	45
論香港前途.....	52
如何穩定這條船？.....	58
香港民意解剖圖.....	63
拿出推行民選制度的時間表來.....	71
校園風波的社會意義.....	76
「向前看」香港未來的動向.....	81
「民主化」大辯論的來龍去脈.....	90
賀維訪華，新意何在？.....	97
中英聯合聲明在倫敦.....	102
政黨政治會在香港出現嗎？.....	109
從區議會選舉看幾個政治問題.....	118
中英關係與香港政局發展.....	123
論資本主義的民主政制.....	130
政制改革與基本法起草的「矛盾」.....	138

民主改革的理論和任務·····	144
新矛盾論	
——中國介入香港政治的效果·····	154
從美國政制看香港模式	
——行政主導有許多牌子·····	162
再論所謂「行政主導」·····	168
《基本法》制訂的危機·····	175

誰來經理香港（一）

對香港前途的幾種估計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前途成為了敏感的人士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這是絕不偶然的關心。中國政局經過了十多年的動亂後，初步穩定了下來，四個現代化計劃正在踏實地推行。在香港，新的一代已經成長，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正積極地尋求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權力。在香港政府內，港督麥理浩任期長達十二年，多位高官到了退休年限仍被挽留，但局面總不能長期如此下去……。

隨着關心而來的是估計。究竟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一九九七年是一個敏感的字眼，但現實的香港人沒有去逃避，他們在估計中國會收回香港嗎？倘若收回又是什麼樣子呢？究竟現在是香港在廣東化呢？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九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港督麥理浩，這次會見，象徵着中英港之間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還是廣州在香港化？中英兩國政府是否在進行某種私底下的談判，正在決定五百多萬香港人的命運呢？推斷是紛紜的，但大致歸納起來却離不開三種基本估計：

第一種是一九九七年的租約問題解決不了，中國在被動的情況下收回香港，中英政府為本身利益都會嚴守秘密，香港經濟因此而有隨時崩潰的危險。支持這種估計的理由是基於下列現象：英資開始流出香港，如滙豐收購美國密蘭銀行；香港市民被列為二等公民，不能隨意移居英國等。

第二種估計是租約問題獲得解決，解決後香港在政體上仍歸英國統治，而中國則加強其在港之影響力。

第三種估計是租約問題獲得解決，但解決後香港在政體上回歸中國統治，而投資者在香港的利益則繼續獲得保障。

其實，以上的幾種估計有着明顯的共同點。

第一是租約問題確實是一個問題，中英雙方雖然在公開表態上把這個問題放得很輕鬆，但作為香港經濟支柱的投資者則觀望着這個信號而決定走勢的。

第二是幾乎沒有人相信香港會獨立。當然，也有一些論者認為香港沒有必須回歸中國的理由。但這些論點大都只不過是在說理，在實際條件下香港能夠獨立的機會是微乎其微，而且也極少人相信香港獨立對香港人會有什麼好處。

第三是香港經濟能否繼續繁榮是看香港前途的中心問題。為了這個問題，無論以什麼形式來解決租約問題，投資者的利益必須獲得照顧。或者是他們的代理人香港殖民地政府能夠繼續管理這塊土地；或者是中國在收回香港管理權後能夠以某種明確的方式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估計還是估計，讓我們看看香港近年的實際。

經濟繁榮的三大要素

相信沒有人能夠否定香港近十年來的經濟成就。香港的經濟能夠繁榮可說是香港能否生存的決定性因素。經濟長足發展，無論對中國、對英國、對投資者和對香港人本身都是好事，十年來這幾方面和睦相處、相安無事，基本上是由繁榮的經濟決定的。

而事實上，在這經濟繁榮的背後，各方面都貢獻了自己的力量。讓我們看一看幾個因素便可以明白了。

第一個因素自然是香港十多年來穩定的政治局面。這是最基本的要素，沒有這，根本就沒有人願意在香港投資，也不能順利地維持正常的生產秩序。香港政府要香港穩定是必然的，故此中共同意香港穩定是極其重要的。無論近幾年香港人自身的社會運動有多大發展，作為政治力量來說，中共在港的力量是唯一可以向安定局面挑戰的力量，中共十多年來沒有扮演這個角色，成全了香港社會的安定，香港才有可能繁榮。

第二個因素是充裕的資金。無可懷疑，缺乏了投資，香港經濟的奇迹就要終結了。倘若不是的話，香港政府不必長期為投資者開方便之門，中國也不用多次叫在香港的投資者放心。不過，同時存在的問題是：投資者最重視的是利潤，只有在有利條件存在時，他們才會玉成香港的繁榮，他們是不會怎樣作出犧牲來協助香港發展的。

第三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香港勞動者質素的提高。七十年代以來，教育在香港的日益普及，培養了新一代年輕、有幹勁的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在保護主義

日益抬頭的世界經濟中，香港要工業多元化，工業要由勞工密集轉為資本密集，要提高商品在市場的競爭能力，沒有了高質素的勞動人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可是，隨着勞動人口質素的提高，也衍生了一些問題：香港新的受過教育的一代要求一個更為民主、開放和合理的社會。近年來權益運動、教育改革等等，正反映了這個要求。

可以說，以上的幾個要素十年來都是朝有利方向發展，但我們上面的分析中也可同時看到不穩定性的存在。踏入八十年代的香港正是受這些不穩定性的考驗，從而引起了各種形式的估計。

這些考驗究竟以什麼形式來出現呢？

考驗主要從兩個方面而來。一個是一九九七年這個日子的逼近。中國和英國政府究竟準備怎樣處理那個滿期的租約呢？第二個是香港人心的向背是怎樣呢？雖然香港命運主要還是由中英雙方決定，但香港人本身却可以破壞這樣或那樣的平衡。

目標相同 立場有別

中英雙方對一九九七年問題的目標基本上是相同的：大家都希望繼續維持香港的繁榮安定。但，他們却有着顯然不同的立場，英國百多年來在香港的統治是以不平等條約作為其基礎的，但中共從來都沒有承認這些條約。

有些人就是持着這個歷史差別去分析中英雙方目前對租約問題態度的分別。中國根本不提那個租約，只叫投資者放心，而香港和英國的法律界好些人士已經急於為這個問題出謀獻策。事實上，中國方面有可

能比表面考慮得更多。

79年五月，中國外交部助理部長宋之光作了一個可算是中國官員對香港問題到目前為止最詳盡的談話。他表示一九九七年以前，中國不會收回香港，這個日子以後的處理方法將會通過協商形式解決，而縱使作出收回香港的決定，中國仍會盡量保障投資者在香港的利益。在這個談話中，宋之光也迴避了一九九七年後是否收回香港的問題，原因何在呢？

第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中國無需要把自己過早地處於被動的地位。一方面，中國政府本身目前也難以估計十多年後內部的政治情況如何，另一方面他們也未能估計國際形勢和英國政府態度的變化。過早地擺明了態度，事實上也減低了將來中國在談判中的本錢。

第二個可能的原因是中國目前在香港的着眼點不是形式上能否收回香港。因為什麼人都明白香港要繼續繁榮下去，香港要能對中國有用，則必須維持香港目前的經濟結構。中共在打倒四人幫後，大幅度地修改了過往在港的空頭政治政策，把主要力量放到了經濟工作上。中國在香港的代理機構，和一些與中國關係密切的華人資本近年來的活躍表現正是這個轉變的體現。如果把香港整體看成是一間發大財的公司，中國目前在港的做法就是逐漸地增加其所佔有的股分，以分取更大的利潤。核心問題不是中國在香港能否獲得管理權，而是何種管理形式才最有利於香港這間「公司」盈利，最有利於中國分多一點紅。中國積極地參與香港經濟只不過短短幾年的時間，試問她又怎能決定香港歸誰管理才最有利於其使用香港哩！



▲ 麥理浩輕鬆寫意地在北京遊覽故宮。

所以說中英雙方大家立場有異，並不是說一方面重視租約，一方面輕視租約那麼簡單，而是在分配香港這間「公司」所帶來利潤的要求上的差別。對於英國人來說，當然想保持住傳統的在港壟斷勢力，對於日漸強大、有壓倒他們之勢的中國資本和華資顯然是有所不滿的。說得簡單化一點，中英雙方猶如香港這間「公司」的合股人，雙方既有共同的利益所在：要香港繁榮，以使從中分得更大的利潤；但亦有矛盾所在：就是各自想佔有較大的利益和較大的控制權。但是這個矛盾目前絕對不會導致拆夥，因為「一拍兩散」的

局面是大家都不想見。何況目前大家絕對的盈利都有增加，問題只是相對盈利的大小，這點亦不足以破壞這個良好的合伙關係。

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

從英國人的角度看，一九九七年後香港仍由他們管理，當然是最好的盈利保證。因為一旦政權易手後，難保這個合伙人有什麼變化。中國所要顧慮的也是這一點。管理權在自己手中是否最好，目前中國還未弄清楚，但也須顧忌一旦把管理權抓到手時會否把合伙人嚇跑了，果如此就倒不如交給合伙人管理還好。可以說，中國目前要有兩個重要問題搞清楚（除了中國內部和國際形勢變化的問題），才可以對一九九七年以後的做法下判斷：一個是中國親自來管理香港的政治是否有利於其經濟繁榮，另一個是中國在香港的影響力能增加到那個程度而不致於超過外來投資者的容忍限度（因為中國若在香港壟斷一切，只能把大部份投資者擠掉）。不過，無論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香港經濟結構的前途只有一個——維持現狀。為達到維持現狀的目標，按目前情況來說，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轉交到中國的手裏好得多。

香港人心的向背

在談論香港前途時，如果眼睛只盯在一九九七這個數字上，只留意中英雙方的態度，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也可能犯上極大的錯誤。香港人心的向背可能是……

顆震撼社會的炸彈。

在一九六六年，當時也沒有人懷疑香港會有什麼人變，但天星小輪加價騷動事件把香港政府嚇了一跳。對於香港政府來說，六六年的騷動事件，青年的不滿情緒比左派有系統的罷工更令人擔憂。因為後者將不會再發生了。民政署長華樂庭於今年初一次講話中也已經開始重視地提出「踏入八十年代，本港社會湧現一股不滿的逆流」。而「目前感到不滿的是白領階級，而非藍領階級。」

如同世界上其他很多戰後新興的社會一樣，香港的新生一代已經日漸成熟。戰後出生的青年人佔了全港人口的一半之上。一批生氣勃勃，精力充沛的青年人正在去佔領香港各方面的主要行政工作。他們生於斯、長於斯，適應香港的生活狀況，也願意為香港的美好前途而努力。如果說一九六六年騷動事件只不過是青年人不滿社會、精力過剩的一種發洩表現，今天這個成熟了的新生一代所要求的就再不是破壞，而是要建設，在他們認同的方向下進行建設。

近年來可以看到的，是權益運動的此起彼伏。新的一代再不像他們的父母那樣溫馴，也不相信窮就不能與富敵，富不可與官爭，不但在港督府的門前經常排着請願的隊伍。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工業行動有隨時癱瘓香港社會機器部分功能的能力。各種形式的壓力團體開始興起，而在近年來特別活躍的如公務員工會、社會工作者、和社區組織者的領導人很多都是年輕一輩。他們縱使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倒是一個影響面廣泛的社會勢力。

那麼，目前這股社會勢力又有什麼要求？

人貴有自知之明。有兩點是現在發出要求香港進行變革的人自己明白的。

第一是他們絕對承認中英雙方是香港前途的決定性力量。所以他們絕不提出獨立，因為明知這既不可能、也只能招來中英雙方的反對。他們也不提出在經濟政策上的綱領，因為香港經濟結構不容改變已是一個現實。但在根本不危害中英雙方利益下，他們要求多一點的政治權利。

第二是他們固然難以走上主導的地位，但他們也有討價還價的力量。一方面是他們土生土長，與作為英國代表的殖民地政府相比，他們與市民的關係較為密切。另一方面是社會趨向現代化，掌握着知識的中產階級和各專門行業的僱員無異越來越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總括起來說，中產階級和壓力團體在香港目前的情況下不可能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但他們可破壞香港社會的平衡，可以產生相當的影響。

香港政府與中共在港力量在處理這個挑戰時，表現出來的是不同的政策。

本地化 分區化 專業化

香港政府面對社會中無黨派勢力的壓力問題，看來遠比中共來得積極，也許因為他們目前是統治者，是這個壓力的主要承受者。

打從七十年代初期起，香港政府就已在政制上採取了不少的改革。這包括大量的增設諮詢委員會、中央政府改組、民政制度的建立和改善，綠皮書政策的推行，推動互助委員會的成立和社區建設等。到了最近，港府又發表了地區行政的綠皮書。

這一份行政改革綠皮書，其實只是港府近年來一連串

政策的一部分，這些政策既改善香港政府的統治效率，也容納和疏導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更部署塑造香港社會的未來。這些政策簡單來說可分為幾個方面。

一個是香港政府進一步本地化。一方面英國再難以物色適當的殖民地高官來負擔香港這塊特殊地方的複雜職務；另一方面香港年輕一代已經成長，可以逐步挑起管理這個社會的重任，他們自身也有着這個要求。逐步的本地化也是有助於洗掉港府官僚化的形象，因為新的一批政務人員大都是在香港社會環境中逐漸取得工作經驗，因此會減少脫離實際的瞎指揮。此外，他們也可逐步把新一代的壓力人物吸納，而換掉舊的「反對派」。在地區行政綠皮書中，市政局權力隱隱地已被削弱，新的分區選舉制度也可能把舊的一些「反對派」角色的人物淘汰出局。港府目前重視的再不是寬情大使式、滔滔不絕批評一番的人物，而是一些掌握着實際影響力的壓力團體。

第二個是分區化的行政模式，是準備有計劃地改善香港政府的行政效率。中央政府內各部門的分割狀態早已引起港府高層人士的不滿。七六年港督的施政報告中，已開始提出社區建設的概念，並開始成立以民政主任為主席的協調委員會來協調社區內的行政。綠皮書中所建議的區管理委員會和區議會只不過是這個模式的發展，也符合港府近年來「行政權力下放、決策權力集中」的方針。有人批評綠皮書分區行政的建議完全沒有下放權力，倒反是加強了控制才真。這樣批評也許有失全面，香港政府透過分區化把觸覺伸到社會每一角，無可否認是加強其管理和控制的效率，但也同樣把行政權力下放到基層官員手中。當然，分區化的政策也有助於疏導長期以來因地少人多所引起的社區矛盾，和應付由這些矛盾而蓬勃的某些壓力